

图与书：先秦两汉时期有关山川神怪类文献的分析

——以《山海经》、《楚辞》、《淮南子》为例

江林昌

内容提要 在夏商周秦汉时期，所谓的“图书”实际包括“图画”与“文字”两部分，如果只有文字而没有图画，则称为“书”。其中，有关山川神怪崇拜为内容的文献，大多是“图”与“书”相结合的“图书”。如《山海经》、《楚辞》、《淮南子》中许多文字都是对天体山川神怪“图”的文字说明“书”。只是到了魏晋以后，《山海经》等文献中的“图”丢失了，只有“书”的部分留传至今。我们今天阅读这批“书”时，应当首先树立其原来有“图”的观念，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完整地把握其真正的内涵。

关键词 “图”与“书” 《九鼎图》、《山海图》与《山海经》 出土丝帛图书与《楚辞》、《淮南子》

史前时期，没有文字。人类的交往主要依靠语言手势。比较重要的公共性场合，如氏族部落的祭祀集会等，还往往借助于一些象形图画。那是一个“图”与“话”相结合的时代。中国史前时期各民族祖先们所交流的“话语”，早已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消失了；而那时的“图画”，则仍有许多保留至今。这就是考古发现所提供的史前时期大量的陶器、玉器、骨器上的刻绘图画符号以及场面较为宏大的岩画、地画等等^①。

当人类进入原史时代后，史前时期那借助图画以表达思想、体现集体意识的传统仍然被继承与发展，同时，由于发明了文字，因而往往将当时的“祭语”、“歌辞”记录在旁。于是就形成了原史时代“图画”与“文字”相结合的“图书”传统。中国夏商周三代，属于原史时期。当时的文字，有许多是配合图画的。到了汉代，由于隶书的出现和纸张的发明，用文字详尽细致表达思想成为可能。于是乎魏晋隋唐以后，书面文献盛行，而原有的一些“图”便逐渐丢失了。这样，就为后代的学人阅读原史时代的有关文献带来了困难。因此，重新揭示夏商周秦汉时期有关“图书”的特点，总结其中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就成了国学研究的重要课题。饶宗颐先生、李学勤师、袁珂先生、李零先生等已在相关的论著中涉及此事，是值得特别感谢的^②。概括起来看，夏商周秦汉时期的“图书”大致可以分为五类，即“宇宙生成类图书”、“山川神怪类图书”、“民族史诗类图书”、“狩猎宴享类图书”、“农事战争类图书”。本文试就其中的山川神怪类图书略作讨论，《山海经》、《楚辞》及《淮南子》是这类“图书”的代表，我们的

① 陶玉器上的刻划图画符号，如黄河下游大汶口陶尊外壁上的“斧钺图”、“日月山图”，黄河中游仰韶文化陶罐上的“鸛鱼石斧图”、“太阳光芒图”，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玉器上的“鸟立山峰图”，等等；地画则如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祖先图腾祭祀图”；岩画则如新疆呼图壁“原始生殖崇拜图”，等等。

② 饶宗颐《澄心论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64—290页；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5—76页；袁珂《神话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李零《中国方术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181页。

讨论将结合有关考古资料展开。

一 《山海经》是对“山海图”的文字说明

现存的《山海经》原是配有“山海图”的。有关这一问题,学术界已有许多讨论。例如,明代杨慎《山海经后考》、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清代阮元《山海经笺疏序》、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序》,以及近现代学者如江绍原、饶宗颐、袁珂、萧兵、马昌仪、沈海波等人,都有明确的论述。这里拟在前圣时贤的基础上,补充三点证据。

证据一:由《中山经》所描绘的山川地理位置及其山川神怪特征,看《山海经》与夏民族及其“九鼎图”的关系

很多学者认为,《山海经》所配的《山海图》,其原型就是禹铸“九鼎图”。这个说法可能有点简单化了。今存《山海经》分“五藏山经”、“海外经”、“海内经”、“大荒经”等部分,其来源应该是多元的。《山海经》中直接与夏民族发生关系的应该是其中的“五藏山经”部分,禹铸“九鼎图”也应该在这个范围内讨论。《左传·宣公三年》载:

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上古汉语里的“物”往往是指“鬼神”。《史记·孝武本纪》:“能使物,却老。”《集解》引如淳曰:“物,鬼物也。”《汉书·高五王传》颜师古注“物谓鬼神。”《左传》所说的“远方图物”之“物”与“铸鼎象物”之“物”都是指“鬼神”。“远方图物,贡金九牧”为互文,意即远方之九牧既图物又贡金。“远方”之“九牧”即周边地区的部落酋长;“图物”即绘画出鬼神之图像;“贡金”则为贡献青铜。《左传》的意思是说,夏朝成为天下盟主时,就命令各地部落将他们所崇拜的山川鬼神等图腾画成图画,连同青铜,一并贡奉到夏王庭中来,夏王庭就用这些青铜铸成了象征部落联盟政权的九鼎,这就是所谓的“铸鼎象物”。

《左传》的这则记载又同时见于《墨子·耕柱》:“昔者夏后开使飞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此外,《史记·楚世家》、《后汉书·明帝纪》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再就考古发现来看,在代表夏代夏族文化的二里头遗址里,出土了青铜鼎、盃、爵、斚等,还有三件由绿松石镶嵌而成的兽面纹铜牌饰。这青铜鼎与《左传》所说之“铸鼎”相一致,而兽面纹铜牌饰则是《左传》所说之“象物”。夏代“图书”之“图”见于青铜器,似可定论。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夏代铸在青铜器上的有关山川神灵之图像,原是有文字说明的。这文字就保留在《山海经》里。杨慎《山海经后考》即指出:

九鼎之图……谓之曰山海图。其文则谓之《山海经》。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也说:

(《山海经》)盖周末之人,因禹铸九鼎,图象百物,使民入山林川泽,备知神奸之说,故所记多魑魅魍魉之类。

阮元《山海经笺疏序》指出:

《左传》称:“禹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禹鼎不可见,今《山海经》或其遗象欤?

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序》也指出:

禹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案其文有国名,有山川,有神灵奇怪之所际,是禹所图也。鼎亡于秦,故其先时人尤能说其图而著于册。

现当代学者江绍原也认为,禹鼎传说是《山海经》中精怪神兽的重要来源^①,袁珂、马昌仪、沈

^① 江绍原《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198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影印,第7—13页。

海波等学者亦认为禹鼎图与《山海经》有内在联系,《山海经》原是有图的^①。

我们认为,学者们关于《山海经》是对“山海图”的文字说明的推断,是可以成立的。但必须指出的是,禹所铸的“九鼎图”只是“山海图”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山海经》中与“九鼎图”直接发生关系的,主要还是“五藏山经”中的“中山经”部分。关于这一推论,我们可以从《中山经》文本考证入手。

《列子·汤问》:“有鸟焉,其名为鹏,翼若垂天之云,其体称焉。世岂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列子是春秋战国之间的人,这段话揭示了夏禹与《山海经》之间的关系。这“翼若垂天之云”的鹏鸟,自然是表示山川神怪等图腾之“物”。大禹出行时见到了它,伯益给它取了名,自然是属于“山海图”的内容,而夷坚将它记录下来,便是属于《山海经》的文字部分了。我们考察今传《山海经》的《中山经》部分,发现其内容确与夏族有直接关系。例如,从地理角度看,《中山经》总共叙述了一百九十七座山脉及相关水系。它们的地望大都集中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陕西东部。这正是夏民族的活动范围中心。试举主要例证如下:

《中山一经》:

薄山之首,曰甘枣之山。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河。……

又东十五里,曰渠猪之山,其上多竹。渠猪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

据郝懿行《山海经笺疏》考证,这些山均在山西西南部的永济、芮城、平陆、垣曲一带。黄河在这里先由北往南流,然后九十度转弯改成向东流。《中山一经》这里所叙诸山是由西往东为序,其最西头的薄山,所出的共水便往西而流入北南走向的黄河,而再往东面的渠猪山所出的溪水便向南流入西东走向的黄河了。

《中山三经》:

又东十里,曰青要之山,实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南望埤渚,禹父之所化。……是山也,宜女子。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

又东四十里,曰宜苏之山……瀟瀟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

又东二十里,曰和山……是山也五曲,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于河。

《中山五经》:

又东十里,曰良余之山……余水出于其间,而北流注于河;乳水出于其间,而东南流注于洛。

又东南十里,曰虫尾之山……龙余之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洛。

《中山六经》:

平逢之山,南望伊洛。

又西十里,曰虺山,交觞之水出于其阳,而南流注于洛。

又西九十里,曰夸父之山……湖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

又西九十里,曰阳华之山……杨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洛。

前叙《中山一经》诸山,均在晋南地区,黄河北岸。而此《中山三经》、《中山五经》、《中山六经》诸山,则正好在豫西地区的北边,黄河南岸,基本上由西而东分布在今潼关、灵宝、三门峡、渑池、义马、新安、洛阳、孟津等陇海铁路一线,所以在山上可以“北望河曲”、“南望伊洛”,其各条河水或北向流注于黄河,或南向流注于洛水。

由黄河往南是洛水,由洛水再往南便是伊水。在洛水与伊水之间,隔着熊耳山山脉。熊耳山之南则有伏牛山。伏牛山的西端在洛水与伊水之间,其东端则在伊水之南。有关这些山脉中的诸山峰与诸河水在《中次二经》、《中次四经》中有记载。

^① 袁珂《神话论文集》,第17—18页;马昌仪《山海经图:寻找〈山海经〉的另一半》,《文学遗产》2000年第6期;沈海波《略论〈山海经图〉的流传情况》,《上海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

《中次四经》:

曰鹿蹄之山……甘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

又西一百二十里,曰厘山……瀟瀟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伊水。

《中次二经》:

又西三百里,曰阳山……阳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

又西百二十里,曰蒹山。蒹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

当这些山水在洛水与伊水之间时,其水便北注洛或南注伊,当山脉再往南移到伊水之南时,其水便北注伊了。郝懿行、徐旭生等已考证,这些山水大致分布在陕西东部的商洛、洛南、丹凤、商南与河南西部的卢氏、栾川、嵩县、宜阳各市县境内。

以上《中山经》所载的晋南与豫西各山水,正好在夏人的活动范围之内。在考古学上,我们已发现了豫西地区河、洛、伊流域的二里头夏文化和晋南地区以夏县东下冯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中山经》的记载与考古学文化完全吻合,使我们看到了《中山经》与夏族的直接关系。

不仅如此,“九鼎图”中的“图”,大多是山川神怪图腾形象,而《中山经》中随处都有对这些图腾的描绘。《中山一经》:

有兽焉,其状如狸,而白尾有鬣,名曰肫肫,养之可以已忧。

《中次二经》:

其中多化蛇,其状如人面而豺身,鸟翼而蛇行,其音如叱呼,见则其邑大水。

有兽焉,其名曰马腹,其状如人面虎身,其音如婴儿,是食人。

《中次三经》:

其中有鸟焉,名曰鵸,其状如鳧,青身而朱目赤尾,食之宜子。

其中多飞鱼,其状如豚而赤文,服之不畏雷,可以御兵。

《中次四经》:

有兽焉,其状如貉而人目,其名曰鹿。

这些神怪图腾形象,一般都有两个特点,一是人面兽身,亦神亦人,如“其状如人面而豺身”、“其状如貉而人目”;二是都有神奇功能,如“养之可以已忧”、“见则其邑大水”等等。这些神怪图腾实际上就是祖先神,所以要对他们进行祭祀。《山经》部分的每一节结尾处都列出相应的祭神礼仪。如《中次七经》:

自休舆之山至于大隗之山,凡十有九山,千一百八十四里。其十六神者,皆豕身而人面。其祠毛用一羊羞,婴用一藻玉瘞。

《中次十二经》:

自篇遇之山至于荣余之山,凡十五山,二千八百里。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其祠毛用一雄鸡,一牝豚刲,糝用糝。

《中山经》还记载了夏族祖先鲧、禹的故事。前引《中次三经》说,由青要山而“南望埤渚,禹父之所化”。关于“埤渚”,郭璞注:“水中州名渚。埤音填。”由前文考证青要山的地望可知,这里的“水”应是指洛水、伊水而言。《水经注》卷一五《伊水》:“埤渚水,水上承陆浑县东埤渚……即《山海经》所谓南望埤渚。”关于“禹父之所化”,汪绂《山海经存》认为即“《左传》言鲧化黄熊,入于羽渊”事。按,《左传·昭公七年》云:“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其事又见于《国语·晋语八》。鲧化黄熊时所入之羽渊,当即《中次三经》所说的“埤渚”之水,也就是伊洛之水,而所谓“夏郊”,自然是在伊洛平原了。夏族祖先鲧化黄熊的羽水在伊河洛河,而三代祭祀的“夏郊”也在伊洛平原,而这最重要的记载恰好在《中山经》中。这就有力地证明了《中山经》与夏族的密切关系。

鲧所化之“黄熊”,唐陆德明《经典释文》“熊,一作能……三足鳖也。”而《山海经·海内经》“帝

令祝融杀鲛于羽郊”，郭璞注引《启筮》：“鲛死三年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无论是黄龙还是三足鳖，均为水中怪物，而这“黄熊”正是夏族祖先鲛之所化。由此可见，在《山海经》中，凡亦人亦兽的形象，正是祖先图腾神。这又再次证明前引《中山经》各节所述山川神怪，以及《左传·宣公三年》所说的“远方图物”之物，都是各氏族部落的祖先图腾神。

在原始社会，各部落都有自己所崇拜的山川神怪图腾。到了夏代，夏族把周围本来各自独立的部落团结起来，组成部落联盟。为了尊重各部落自己的宗教信仰，夏族在铸九鼎时让各部落提供他们各自的神怪信仰图腾，统一铸在九鼎上。当然，夏族祖先图腾像应该是这九鼎图中的主体，而对这主体图作文字说明的便是《山经》中的《中山经》部分。而对周边联盟部落图腾神怪图作文字说明的便是南、西、北、东诸《山经》。今本《山海经》全书三万余字，主体部分在《山经》五卷，总共两万多字，《海经》虽然有十三卷，但总共只有九千余字，还不到全书的三分之一。而在《山经》五卷中，又以《中山经》为主，共十二节，近一万字，而《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四卷，也总共只有十四节，一万余字。《中山经》的内容是直接有关夏族的，所以在整部《山海经》中所占比重最多，几乎占了全书的三分之一。

《左传·宣公三年》说“远方图物，贡金九牧”，估计各联盟部落向夏部落盟主提供青铜及其祖先图腾画时，也附有相应的文字说明。到了夏盟主称王后，再由夏族首领及其巫史集团，统一铸成“九鼎图”，并集成《山经》书，这就是《中山经》与《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部分，合称《五藏山经》。估计在先秦时期，《五藏山经》与《海外经》、《海内经》、《大荒经》等部分，都是单本流行的。

司马迁与王充还曾见到过单行本《山经》。《史记·大宛列传》赞：“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而据东汉王充《论衡·谈天》所引，司马迁原话中的《山海经》只作《山经》，没有“海”字。王充自己的论述也只作《山经》：

案禹之《山经》，淮南之《地形》，以察邹子之书，虚妄之言也。太史公曰：“……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案太史公之言，《山经》、《禹记》，虚妄之言。

这段文字表明，王充所见到的《史记》是只作《山经》的，而王充本人也承认《山经》单本这一事实。这当中也透露出《山经》古本的流传是久已有之。估计《海内经》、《海外经》、《大荒经》各部分在那时候也在单篇单本流传。西汉末年刘向、刘歆整理国家图书时，才将它们集为一本，合称《山海经》。据刘歆《山海经叙录》称，刘向校书时得《山海经》三十二篇，刘歆作《七略》时定为十八篇。至班固编《汉书·艺文志》时，只有十三篇，入于《数术略》之《刑法》类。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认为：“《七略》校定《山海经》十八篇，而《班志》独十三篇……盖弃《大荒经》以下五篇不计也。”再到晋郭璞注《山海经》时，才又补上《大荒经》以下五卷成十八卷。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山海经》目次。

证据二：由《山海经》的文字表达方式与郭璞《山海经》注看《山海经》的配图性质

《山经》与“禹鼎图”及夏族之间的直接关系已如上述。事实上，《海经》中的文字也与“山海图”有关。袁珂先生在其《山海经全译》前言里指出：《山海经》中的“《海经》……当是先有图画，然后有文字。文字不过是用来作为图画的说明的”。我们今天读《山海经》郭璞注时，还能发现他在许多场合指出了《山海经》文字的配图性质。如《海外南经》：

“羽民国”条，郭璞注：“能飞不能远，卵生，画似仙人也。”

“其为人长颊”条，郭璞注：“羽民之状，鸟喙赤目而白首。”

“其为人小颊赤肩”条，郭璞注：“当（肩）胛上正赤也。”

“谨头国”条：郭璞注：“谨兜，尧臣，有罪，自投南海而死。帝怜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画亦似仙人也。”

“长臂国”条，郭璞注：“旧说云，其人，手下垂至地。”

“离朱”条，郭璞注：“木名也，见《庄子》。今图作赤鸟。”

《海内南经》：

“雕题国”条，郭璞注：“点涅其面，画体为鳞采，即鲛人也。”

“犀牛”条，郭璞注：“犀牛似水牛，猪头，庠脚，三角。”

《西山经》：

“器兽”条，郭璞注：“亦在畏兽画中，似猕猴投掷也。”

《大荒北经》：

“强良”条，郭璞注：“亦在畏兽画中。”

我们具体分析郭璞注，发现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既解说“经”，又解说“图”。如说“灌头”就是“灌兜，尧臣，有罪，自投南海而死”云云；显然是对《山海经》里有关“灌头国”文字的进一步解释。接着，郭注又说“画亦似仙人也”，显然是对“山海图”的解释。郭璞的这一条注文是既注“经”，又注“图”。同样的情况，又见于“羽民国”，郭璞说“能飞不能远，卵生”是注“经”，“画似仙人也”则是注“图”。

第二种情况是直接注“图”。如《山海经》原文说，羽民国的人“其为人长颊”，郭璞对此句所作的注则说：“羽民之状，鸟喙赤目而白首。”注明“山海图”里的羽民形状是“鸟喙”、“赤目”、“白首”。又如注“雕题国”说：“点涅其面，画体为鳞采，即鲛人也。”显然是对“图”的描述。其他如“当肩胛上正赤也”、“其人手下垂至地”等等，均是对“山海图”的注解。

第三种情况是告诉我们，郭璞所见除了“山海图”之外，还有其他类似的图画。如注“器兽”、“强良”诸条，均说“亦在畏兽画中”。这“亦”字说明当郭璞见到“山海图”里的“器兽”、“强良”时，他马上联想到，这“器兽”、“强良”形象还见于另一画册“畏兽画”中，所以他特别注了出来，以便读者参看。

以上通过对郭璞注的分析，进一步证明《山海经》确是为了解释“山海图”的。当然，郭璞生活的魏晋时代所流传的“山海图”已不是九鼎上的原图，而是单本别行的画册之类了。诚如毕沅《山海经新校正》所指出：“《山海经》有古图，有汉所传图，有梁张僧繇等图。”但这些《山海经》画册的内容与夏禹时的“九鼎图”应该有渊源关系。

当我们认识到了《山海经》与“山海图”这一性质的关系之后，再来读《山海经》，便会发现其中许多文字都是对图画的说明。如《海外南经》：

比翼鸟在其东，其为鸟青赤，两鸟比翼。

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

毕方鸟在其东，青水西，其为鸟人面一脚。

长臂国在其东，捕鱼水中，两手各操一鱼。

《海外东经》：

奢比之尸在其北，兽身、人面、大耳，珥两青蛇。

雨师妾在其北，其为人黑，两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

以上所举各例，都是对“山海图”的讲解。先指出画面的方位背景，如“毕方鸟在其东，青水西”。然后描述画中主体神灵的形象，如“其为鸟人面一脚”。再接着描摹神怪的动作，如“捕鱼水中，两手各操一鱼”、“珥两青蛇”，等等。明代学者胡应麟已注意到《山海经》文字原是为描述图画而作这一特点，其《少室山房笔丛》指出：

（《山海经》）载叔均方耕，灌兜方捕鱼，长臂人两手各操一鱼，竖亥右手把算，羿执弓矢，凿齿执盾，此类皆与纪事之词大异。……意古先有斯图，撰者因而纪之，故其文义应尔。

胡应麟特别强调，《山海经》这些描述图画的文字，“与纪事之词大异”，是十分准确的。

证据三：由《淮南子·地形训》证明《山海经·海外经》是解说图画的文章

《山海经》是因图以为文。这一认识还可通过与《淮南子·地形训》的比较研究中获得佐证。《山海经·海外经》四篇的内容都是记录边远地区诸氏族国的异人异物。《淮南子·地形训》也记载有“海外三十六国”，其中提到的氏族国名称与《海外经》大致相同。只不过两书叙述的方向有异同，因此，同样的氏族国名，在两书中出现的先后顺序也有异同。

第一组，顺序相反。《淮南子·地形训》说：“自西北至西南方，有修股民，天民，肃慎民，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奇股民，一臂民，三身民。”《山海经·海外西经》所叙述的顺序方向正好相反：“海外自西南陬至西北陬者。”因为《地形训》是自西北开始逆时针向西南一一叙述各氏族国，而《海外西经》则是从西南开始顺时针向西北叙述。因此，《海外西经》的开头一国刚好是《地形训》的末尾一国，而《海外西经》的末尾一国则刚好是《地形训》的开头一国。现将《海外西经》所叙各国按顺序列下：

三身国，一臂国，奇肱国，丈夫国，巫咸国，女子国，轩辕国，白民国，肃慎国，长股国。这里的“三身国”即《地形训》末尾之“三身民”，而“长股国”即《地形训》开头之“修股民”，顺序恰好相反。而两者的国名大致相同，“修”“长”同义。当然这其中也有少数称名有异，如《海外西经》的“轩辕国”、“巫咸国”不见于《地形训》，而《地形训》的“天民”、“沃民”不见于《海外西经》。

第二组，顺序相同。《地形训》说：“自西南至东南方，结胸民，羽民，灌头国民，裸国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胸民，反舌民，豕喙民，凿齿民，三头民，修臂民。”共十三国。《海外南经》与此顺序一致，因此所叙氏族国顺序与称名亦大致相同：“海外自西南陬至东南陬者。”有：

结胸国，羽民国，灌头国，厌火国，三苗国，戴国，贯匈国，交胫国，不死民，歧舌国，三首国，周饶国，长臂国。

亦十三国，只有少数国名不同。

第三组，顺序相同。《地形训》：“自东南至东北方，有大人国，君子国，黑齿民，玄股民，毛民，劳民。”共六国。《海外东经》叙述顺序与称名亦同：“海外自东南陬至东北陬者。”有：

大人国，君子国，青丘国，黑齿国，玄股国，毛民国，劳民国。

共七国，多出者为“青丘国”。

第四组，顺序相反。《地形训》：“自东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婴民，深目民，无肠民，柔利民，一目民，无继民。”共七国。《海外北经》：“海外自东北陬至西北陬者。”袁珂先生据文义考证，此“自东北”至“西北”当为“自西北”至“东北”之讹：“此云‘自东北陬至西北陬’，则文中诸国均应西向。今既云‘××国在其东’，可见应是‘自西北陬至东北陬’，‘东’‘西’二字适倒。”^①袁说正确。因为《海外北经》国名顺序刚好与《地形训》相反，当是叙述顺序相反所致：

无脰（脰即启，继）国，一目国，柔利国，深目国，无肠国，聂耳国，博父国，拘纓国，跂踵国。共九国，多出“聂耳国”、“博父国”，其余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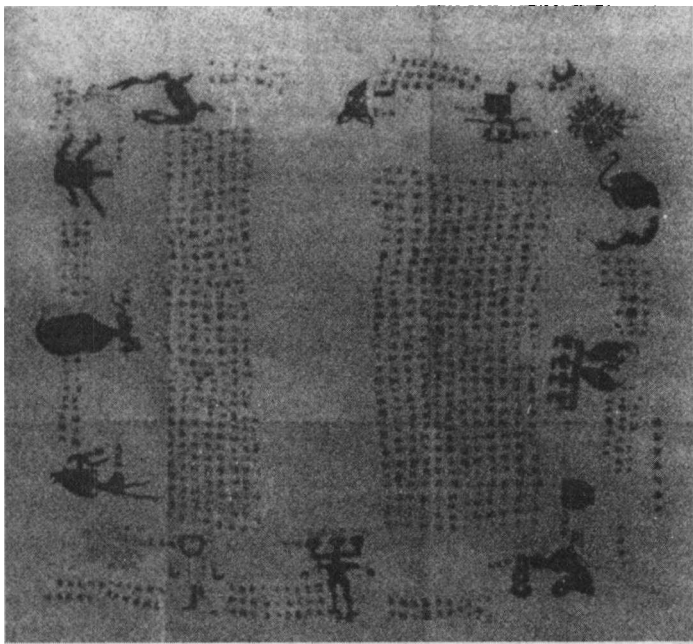
以上四组比较说明一个事实，即《海外经》与《地形训》所依据的是同一组图。因此，当他们叙述顺序一致时，所见氏族国的顺序与名称就相同；反之，如果对同一图所叙顺序相反，那么所见氏族国名的顺序亦反。正如清毕沅《山海经新校正》所指出：“《淮南子·地形训》云，自西北至西南方，起修股民、肃慎民，此文正倒。知此经是说图之词，或右行则自西南至西北起三身国，或左行则自西北至西南起修股民。是汉时犹有《山海经图》，各依所见为说，故不同也。”以上事实再一次证明，今天所见《山海经》原是解图的文字。

① 袁珂《山海经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页。

二 《楚辞》、《淮南子》中许多文字也是对山川神怪“图”所作的说明“书”

1. 子弹库丝帛《月忌图书》与《楚辞》、《淮南子》的对证

湖南长沙子弹库战国丝帛“图书”的“书”由《宇宙篇》、《天象篇》、《月忌篇》三篇文字组成，而“图”则由十二个怪兽月神象组成的长方形框架和交角处代表四方四时的四神木所组成。每个怪兽月神像旁有一段文字说明，十二个怪兽月神像与十二段文字说明就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月忌篇》。



子弹库丝帛《宇宙》、《天象》、《月忌》

每个怪兽月神像的文字说明均有题目有正文。题目均为三个字，据李学勤先生考证，头一字为月名，后两字为神名，如三月：“乘，司春”，“乘”为月名，“司春”为该月神名。七月：“仓，莫得”，“仓”为月名，“莫得”为该月神名。再接着是正文，说明该月的宜忌，如二月份，“可以出师、筑邑，不可以嫁女”，等等。至于这十二个怪兽月神像的状貌，李学勤师也有描述，兹逐录前三个月于下，以便讨论：

一月：取，于下

兽身鸟足，长颈蛇首，口吐歧舌，全身作蜷曲状。首足赤色，身尾青色。

二月：女，口武

双鸟身，尾如雄鸡，爪均内向，青红二色。四首皆方形，面白色，方眼无眸……

三月：乘，司春

鸟身，似有爪及短尾。方首，面青色，无耳，方眼无眸，顶有短毛。

看了这些月神形象的文字描述，使我们立即想起了《山海经》中有关山川神怪形象的文字描述。兹摘录数则，以资比较：

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海外北经》）

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海外东经》）

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海内东经》）

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猿，左右有首。（《海内经》）

以上材料表明，《山海经》中关于天体山川神怪的文字说明，与子弹库帛书《月忌图书》中所提供的神怪形象是一致的。

以这样的认识为基础，我们再来看《楚辞》中的许多文字，原来也都是对天体山川神怪的文字说明。王逸《楚辞章句》也指出，屈原的《天问》原是因壁画而作：

屈原放逐……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谲诡，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疲）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

再看《天问》中关于山川神怪类的文字描写：

雄虺九首，倏忽焉在？何所不死，长人何守？

靡萍九衢，枿华安居？一蛇吞象，厥大何如？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寿何所止？

鲧鱼何所，魓堆焉处？羿焉弹日，乌焉解羽？

这正是屈原见了壁画上“山川神灵”“怪物行事”图像之后，以发问的形式记录下来的。有趣的是，这些山川神怪形象与《山海经》、《淮南子》里的文字记录相一致。兹比较如下：

《天问》	《山海经》、《淮南子》
雄虺九首	大荒之中……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大荒北经》）
何所不死	不死民在其东，其为人黑色，寿不死。（《海外南经》）
靡萍九衢	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名曰帝休，叶状如杨，其枝五衢。（《中次七经》）
一蛇吞象	巴蛇吞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海内南经》）
黑水玄趾	昆仑山上……黑水出焉……是多怪鸟兽。（《西山经》）
三危安在	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是山也，广员百里。（《西山经》）
延年不死	流沙之东，黑水之间，有山名不死之山。（《西山经》）
鲧鱼何所	陵鱼人面，手足，鱼身，在海中。（《海内北经》）
魓堆焉处	有鸟焉，其状如鸡而白首……其名曰魓雀，亦食人。（《东次四经》）
羿焉弹日 乌焉解羽	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乌。（《大荒东经》） 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尧乃使羿……上射十日。（《本经训》）

由上可知，《天问》与《山海经》、《淮南子》的文字基本一致，而且与子弹库帛书十二月怪兽神像也相近。屈原所见的宗庙壁画与《山海经》所赖以解说的“山海图”，我们今天已不得而见，所幸的是子弹库帛书十二月怪兽神像给我们提供了当时图画的部分原貌，这是十分值得珍惜的。

2. 马王堆丝帛《太一神图书》等与《楚辞》、《淮南子》的对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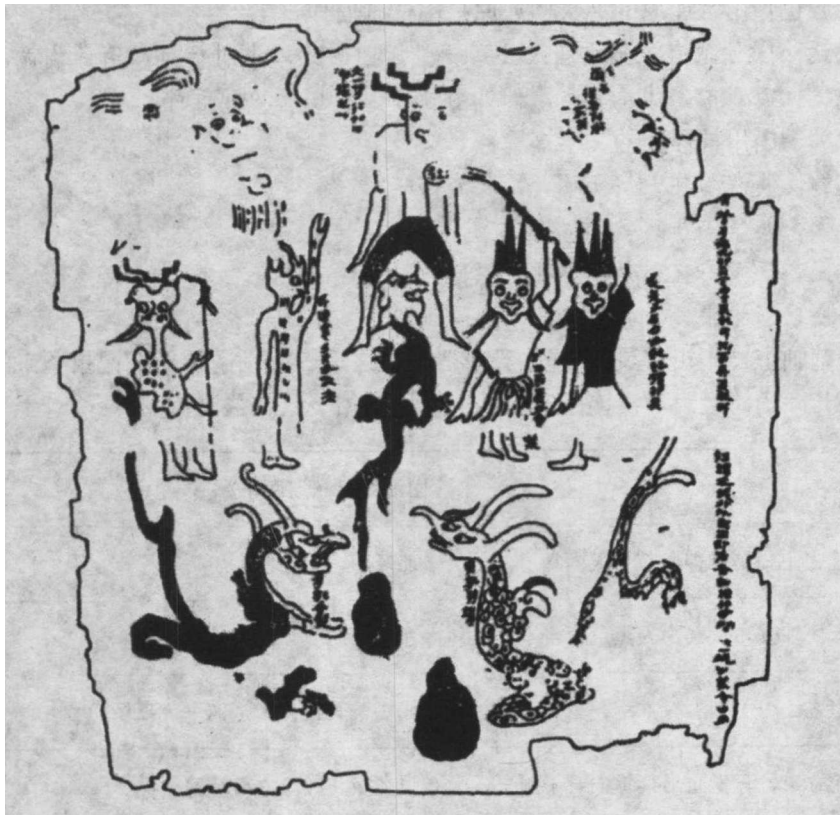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份丝帛《太一神图书》。此图书分为三层：

上层，三个神像：居中神像最大，是整幅图的主神，标有神名曰“太一”。右边一神像侧脸朝

右，题名曰“雨师”。左边一神像脸微侧左向，题名曰“雷（公）”。

中层，四个武弟子：右起第一人所执兵器残泐，第二人执剑，第三人似着可御弓矢之甲冑，第四人执戟。四人左右各二，中间为上层太一神的下膊，膊下有一黄首青身之龙。

下层，两条相向之龙：右边是“持炉”的“黄龙”，左边是“奉鬯”的“青龙”。



马王堆丝帛《太一神图》

整幅图画有总题记，每层各神又有分题记，是为“图书”之“书”的内容。总题记（在帛书右缘直行）：

□将（？）承弓先行，赤□白□莫敢我乡（向），百兵莫敢我伤。□□狂，谓不诚，北斗为正。

即左右□，经行毋顾，太一祝曰：某今日且□□。

分题记（上层中间的太一神的题记共两行）残不全：

太一将行……

神从之，以……

其余题记此略。总起来看，整幅丝帛，“图”有主次，“文”有总论与分叙。图与文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篇相当完整的“图书”。

这幅丝帛“图书”总题记以“太一祝曰”为结，而主神题记以“太一将行”开始。可见，“图书”的总题目和主题都应该是“太一神”。我们曾考证，“太一神”就是太阳神^①。

“图书”上层在“太一神”左右，分别为“雨师”、“雷公”，则第一层为日、雨、雷天体神。“太一将行”而“神从之”，这所从之神，第一层自然是雨师和雷公。这是宇宙起源的初始阶段。“太一将行”与《老子》二十五章曰“太曰逝，逝曰远，远曰返”、“周行而不殆”以及“道”之本义为太阳循环运行相一致。

① 江林昌《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研究》，齐鲁书社1998年版。

“太一将行”所从之神的第二层次便是图中间的四个武弟子。在古代宇宙哲学观里，兵器与四方四时观念是相联系的。如《管子·幼官》以矛、戟、剑、盾配春、夏、秋、冬。其他如《淮南子·时则训》、《洪范五行传》等也都有大致相同的记载。据李零先生分析，这丝帛“太一图书”中间层的“四个武弟子，右边两人可能是代表东、春（？）和西、秋（剑），左边两人可能是代表北、冬（甲可以避弓矢）和南、夏（戟）”^①。可见，帛画“太一神”与“四个武弟子”的组合正是太阳运行而有四方四时的所谓“太一生四象”的宇宙观的集中反映，与《礼运》所载“太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完全一致。

马王堆丝帛《太一神图书》所表现的太阳神运行“图”与“书”，正好在《九歌》、《天问》、《山海经》、《淮南子》等书里有相应的文字，从而使我们明白，这些文献原来也是与“图”有关系的。

丝帛《太一神图书》说：“太一将行……神从之，以……”

《九歌·东君》说：“瞰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

《天问》说：“（日）出自汤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几里。”

《山海经·海外东经》说：“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

《淮南子·天文训》说：“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

帛画中太阳神居中，四季神在下随从，表现出了太阳运行而有昼夜四季变化的动态过程。帛书作为题记就把这个过程描述出来：“太一将行……神从之，以……”《九歌·东君》则把太阳东升时的情景描写了出来，说太阳从东方升起，灿烂的阳光从扶桑树梢射到农家门槛上。《天问》、《山海经》、《淮南子》则描述了太阳从早到晚整个空中的运“行”过程。再接下来便是黑夜的到来。

丝帛《太一神图书》说：“□将（？）承弓先行，赤□白□莫敢我乡（向），百兵莫敢我伤。□□狂，谓不诚，北斗为正。”

《九歌·东君》说：“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撰余轡兮高驰翔，杳冥冥兮以东行。”

《天问》说：“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女岐无合，夫焉取九子？伯强何处，惠气安在？”

由帛书“北斗为正”、《东君》“援北斗”、《天问》“夜光何德”可知，这是写日月的夜间运行。由于这三段文字都是对画而述，而画面上的日月运行是以神怪的形象表现出来的，因而所有的文字都具有形象立体感和动态感。丝帛《太一神图书》里的“承弓先行”，《东君》的“举长矢”、“操余弧”都是日月光芒的物化形象。在神话思维里，“弧弓”、“矢簇”都是日月光芒的比喻。利普斯《事物的起源》说“太阳光芒是太阳射向地球的箭”，《墨子·经说下》也说“光之（至）人，照若射”。云南沧源岩画的太阳神正是作手持弓箭状。丝帛《太一神图书》“承弓先行”还是太阳神的白天行为，而《东君》“举长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沦降”，则是太阳神的夜间行为了。“天狼”是星名，太阳西下，长长的光线慢慢收缩，所以说是“长矢射天狼”、“操弧反沦降”。

《天问》的“顾菟”与“女岐”则是写夜间的月亮与星星。当白天太阳行空时，月亮隐藏起来了，如同死去一般；当夜间太阳收束“弓矢”而西下时，月亮又升起来了，所以说是“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是指月中黑影蟾蜍。“女岐”本指星名，原名九嬭，音转为女岐，传说她无夫而生九子，又称九子母，详见王逸《楚辞章句》。伯强即禹强，亦为星名，又为风神名。

以上马王堆丝帛《太一神图书》、《东君》、《天问》所写的天体神怪形象，在先秦大概是普遍存在的，所以除了马王堆帛画外，考古工作者又于1973年在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中清理出了一幅帛画《人物驭龙图》。其画面内容正可以与上述马王堆帛画及《东君》、《天问》文字相配合。

画正中为一男性神像，侧身直立，腰佩长剑，手执纆绳，驾驭着以龙为船头以凤为船尾的舟车。

^① 李零《马王堆汉墓“神祇图”应属避兵图》，《考古》1991年第10期。

神像的头顶为伞形的輿盖，象征圆天。舟车下前方有一鲤鱼，表明与黄泉或大海有关。整幅画表达了太阳神昼夜运行于天地之间的意思。而这一主题与前述的马王堆帛画、《东君》、《天问》的描述是相一致的。如画中神像身着长袍，腰佩长剑，即《东君》之“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也就是马王堆帛画的太一神“承弓先行”形象。画中輿盖上三根飘带随风往后拂动，表明神人正驾龙凤之舟车前行。此即《东君》之“驾龙辀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亦与马王堆帛画太一神之胯下三龙相呼应。



子弹库丝帛《人物驭龙图》

画的上方为伞形輿盖，表示圆形的天空。这与太阳神的白天运行相一致。此即《东君》之“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天问》之“出自汤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几里”，马王堆帛画之“太一将行，神从之”。画中舟车下方的鱼，表示太阳神的黑夜地泉运行。此即《东君》之“撰余轡兮高驰翔，杳冥冥兮以东行”，《淮南子·天文训》所谓“日入于虞渊之汜，曙于蒙谷之浦”。

子弹库帛画中神人驾龙舟形象与马王堆帛画中太一神之跨下三龙形象相一致。这大概是古代天象神怪图的主题，影响至为深广。《楚辞》、《山海经》等书中屡言神巫驾龙乘风、策马呼云而上下天地之间者，应该都是以子弹库帛画、马王堆帛画之类为基础的。兹将有关文字列下，以见一斑。见于《离骚》者：

“驷玉虬以乘鸞兮，溘埃风余上征。”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
 “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
 “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阊风而继马。”
 “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
 “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
 “扬云霓之旖旎兮，鸣玉鸾之啾啾。”
 “麾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
 “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轭而并驰。”
 “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

见于《九歌》者：

《云中君》：“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
 《湘君》：“驾飞龙兮北征，遭吾道兮洞庭。”
 《大司命》：“乘龙兮鳞鳞，高驰兮冲天。”
 《河伯》：“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

见于《山海经》者：

“南方祝融，兽身人面，乘两龙。”（《海外南经》）
 “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海外西经》）
 “奇肱之国在其北，其人一臂三目，有阴有阳，乘文马。”（《海外西经》）
 “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海外西经》）
 “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海外东经》）

以上文字，应该就是马王堆帛画与子弹库帛画的讲解书，其中“驾龙”、“乘车”、“饮马”、“腾云”等等，已经成了讲解图画的专门术语。相关的术语还有马王堆帛书中“太一将行”、“承弓先行”的“行”，“北斗为正”的“为正（证）”，“经行毋顾”的“经行”。而这些术语在《楚辞》中均屡屡出现。如关于“行”：

《东君》：“撰余辔兮高驰翔，杳冥冥兮以东行。”
 《河伯》：“与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
 《湘君》：“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
 《离骚》：“灵氛既告余以吉占兮，历吉日乎吾将行。”“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关于“为正（证）”：

《离骚》：“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惜诵》：“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

关于“经行”：

《离骚》：“路修远以多艰兮，腾众车使径待。”
 《远游》：“左雨师使径待兮，右雷公以为卫。”“阳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径度。”

再接下来，我们讨论《山鬼》与“山鬼图”。1949年，在长沙东郊陈家山战国楚墓中出土了一幅帛画《人物龙凤图》。饶宗颐先生认为这就是“山鬼图”，并作分析说：“往读《九歌·山鬼》，以为《九歌》乃南楚之祀神之曲。作者既自托于山鬼，幽篁蔽天，冥冥昼晦，宣为狰狞可怖之状；而乃披萝带荔，以缠绵婀娜之情出之，深不可解。……今展斯图，果为窈窕佚女，前有夔龙，山之精也；凤凰在侧，将以为媒也（即《离骚》“凤皇既受诒”之意）。神人相恋相杂之情，于焉可睹。《九歌》所祀之鬼，乃为神女，斯其明证。则是图者，目为山鬼之图，无不可矣。”^①

① 饶宗颐《“九歌”与图画》，《澄心论萃》，第282—284页。

饶先生不仅认为画中的女神形象与山鬼形象相同，而且画中的夔龙在神话传说中即与山鬼有关。洪兴祖《楚辞补注》曰：“山鬼，《庄子》曰山有夔。”朱熹《楚辞集注》、林云铭《楚辞灯》均认为山鬼即山中夔龙。《九歌·山鬼》中的山鬼是一个渴慕爱情的女子形象，而《人物龙凤图》正是一窈窕佚女前夔龙与凤鸟飞腾的形象，夔龙即山鬼，凤鸟为情媒。我们再看《山鬼》的文字，其画面感



陈家山丝帛《人物龙凤图》

很鲜明：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
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

开头四句先画出山鬼的形貌神态，“含睇”、“宜笑”、“善窈窕”，栩栩如生，楚楚动人。王逸《楚辞章句》“言山鬼之貌既以姱丽，亦复慕我有善行好姿，故来见其容也。”再四句写山鬼的行为目的，“乘赤豹”、“从文狸”，体现其山鬼神怪之特色；而“辛夷”、“石兰”、“杜衡”均为芳草香木，显示出其青春女子的气息，“折芳馨兮遗所思”则闪耀着思恋喜悦的光辉。山鬼形象非人非鬼，亦人亦鬼，光彩照人，睹之

难以忘怀。

我们相信,在屈原加工润色《河伯》、《山鬼》、《湘君》、《湘夫人》时,楚地一定是流传有相应的图画的。这些图画也许有许多不同的版本,但基本主题形象应该差不多。上述《人物龙凤图》也许是楚地流传“山鬼图”的一种版本。我们期待在以后的考古发现中能出现“山鬼图”的其他版本,以及相应的“河伯图”、“湘君图”、“湘夫人图”。

三 简短余论

需要说明的是,并非先秦秦汉时期的所有文献都是配图的。就现有的资料考察,只有那些涉及宗教祭祀、社团集会的内容才会有“生动的画面”与“文字解说”,从而构成完整的“图书”。具体而论,先秦秦汉时期的“图书”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1. 有关天体宇宙起源及其神灵的探索思考;
2. 有关山川地理特征及其神怪的敬畏祭祀;
3. 有关图腾崇拜与祖先起源的回忆歌颂;
4. 有关氏族部落狩猎、农作、战争、会盟、朝聘等的叙述庆祝。

至于先秦秦汉时期的议论说理文如诸子散文之类,自然是不配图的。这些文献只能称“书”,而不能称“图书”。《汉书·艺文志》:“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这里“诸子之言”、“文章”、“篇籍”所指同一,只称其为“书”,而不称其为“图书”,可证。还有一些关于典章制度、法律公文之类的文献,也是不配图的。如《史记·张丞相列传》:“张苍乃自秦时为柱下史,明习天下图书、计籍。”《史记·萧相国世家》:“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前者以“图书”与“计籍”并提,后者以“图书”与“律令”并言。可见“计籍”、“律令”与“图书”是不同的。“图书”只是先秦秦汉文献中的一种,在当时曾经盛行。

[作者简介] 江林昌, 1961年生。1994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获博士学位,现为山东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教授。发表过专著《楚辞与上古历史文化研究》等。